

“我们必须 为融合创造良好的 条件”

采访 PB Swiss Tools 首席执行官 Eva Jaisli 和企业顾问 Admir Opardija

Eva Jaisli, 和她的公司 PB Swiss Tools 在 Emmental 为全世界生产着高品质工具 – 员工中 30% 为女性。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 她还雇用了十二名泰米尔难民 – 现在, 他们的孩子已在 PB Swiss Tools 工作。为什么会这样?

Eva Jaisli: 实际上, 当时的情况和今天差不多。在 90 年代初期, 有很多人从斯里兰卡来到瑞士, 尤其是来到伯尔尼。Emmental 非常热心地收容了这些难民, 并提供了相应的基础设施。我们和政府部门合作, 并与其他企业一起寻求解决思路。我们建议对他们进行培训, 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雇用。在我们公司, 员工们对此事同样非常热心。他们向这些人提供支持, 向他们解释协会的活动, 因为在我们农村, 各种协会对于人们之间的联系非常重要。这时一项共同的任务, 我们一起尽自己所能, 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政府部门、雇员、雇主、协会, 培训人员相互之间密切联系。



Eva Jaisli 和 Admir Opardija, 在苏黎世的 Hardbrücke 上



Admir, 1993 年你作为波斯尼亚难民来到瑞士。1997 年, 当你在苏黎世 Wiedikon 上学时, 是一个委员会的努力, 让你得以在瑞士继续你的学业, 而不必回到波斯尼亚。得到这么多的支持, 你的感受如何?

Admir Opardija: 我有幸结识了很多像 Eva Jaisli 这样的人。1997 年, 波斯尼亚难民被要求返回他们的家乡。我的父亲当时很乐意回去, 因为他在瑞士从有过踏实的感觉。我的父母让我自己决定是否留在这里。我们当时在苏黎世有约 20 个年轻人接受教育。对于我们来说, 在波斯尼亚继续这样的教育是很困难的, 因为教育体系完全不同。我九岁时来到瑞士, 我生活的中心就在这里, 我有我的朋友。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抉择时, 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熟人圈中, 立刻就有很多人声援我们。报纸上刊登了文章, 在很短时间内, 便收集到了 10000 个签名。我们获得的支持令人难以置信 – 即使是一些我不认识的人, 也来支持我们, 呼吁保护我们受教育的权利。

Jaisli 女士, 您说到您的泰米尔员工非常忠诚, 并推动了公司的发展。在您这方面需要付出多少努力?

Jaisli: 融合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把语言拿出来看作融合的标准, 那么有些人在这期间已能说一口流利的“伯尔尼德语”, 而另一些人则要差一些。前者一般可能孩子较多, 这样就会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他们提高。我相信, 我们能够向新员工传递信息, 他们在这里是受欢迎的, 并可以在我们这里立足, 因为我们让他们看到了长远的前景。他们认识到, 大门已为他们敞开。我们同时还采取了一些辅助性的措施, 例如培训和语言课程。后者我们一直都在进行。有些时候, 我们也会施加一点压力; 我们告知他们, 重要的是, 不仅要

Eva Jaisli

*1958, 20 年来, 领导着位于 Emmental 的家族企业 PB Swiss Tools, 为全世界生产高品质工具。她拥有心理学和社会工作本科学位, 并攻读了企业管理/机构发展硕士学位。此外, 她还拥有国际营销的 MBA 学位。

Admir Opardija

*1983, 于 1993 年作为难民从波斯尼亚来到瑞士。他在苏黎世大学完成了经济学的学习, 今天在一家企业咨询公司工作。

参加一个语言课程，而且要参加多个。我们共同制定目标。令员工最终能够达到这些目标，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我们必须创造良好的条件，否则便不能实现工作融合。

作为企业领导，您要求瑞士的雇主更加投入，因为雇用难民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您得到了怎样的反应？

Jaisli: 差异很大。有些人非常支持和重视这件事情，但我也听到很多讥讽的评论。有些人写道，他们将永远不再向我们购买工具。其他人则呼吁本国公民优先。在我参加的

人们经常以别人的看法去审视自己，尤其是在作为陌生人的时候。我的例子同时表明，对于教育的投资是值得的。我今天有一份好工作，我在瑞士消费，并在这里交税” Admir Opardija

Swissmem，瑞士机械、电气和金属工业协会中，我们在双边协定的框架内已多次指出，不仅是要招募外国的技术人员，而且要优先为那些已经在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人提供工作。我作过很多次访谈，以阐明这一立场。从根本上讲，我的呼吁产生了强烈反响。对于这一话题的看法出现了两极分化：我感觉人们的意见黑白分明。

Admir，你的父母回到波斯尼亚后，你由一个家庭照顾。然后，你在苏黎世大学完成了经济学学习。换句话说：你为自己创造了一份理想的职业。你是怎么做到的，实现这一切需要哪些条件？

Opardija: 我相信这条道路在一开始便已经选定了：我和我的父母一起来到一个相对富裕的社区 Uitikon/Waldegg。在我的班级里有 15 个孩子，我是唯一的外国人。我的老师说，我应该尝试尽可能跟上进度；我没有参加德语补习班。这个方法对我很有效，因为老师一开始就没有对我另眼相看。我的父母给了我必要的支持，他们总是说：“你的教育是最重要的。”此外，我的老师也很支持我。他后来还写信给 Wiedikon 中学，向负责人说明了我的情况。坦白讲，我从来没有感受到我的难民身份。当我的父母返回波斯尼亚时，一个

如果我们今天找不出如何令难民自食其力的解决方案，我们非常明白，这将会带来怎样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Eva Jaisli

来自 Uitikon/Waldegg 的朋友家庭表示愿意接纳我。我和他们一起待了七年。他们待我就像自己的儿子。我特别感谢我的瑞士家人，他们是我的榜样。当我回顾过往时，我记起的只有瑞士美好的一面。**Jaisli:** 我想，你有着不负众望的潜质。人们的期望也是一种动力，你周围的人们都相信你，这是极为有益的事情。**Opardija:** 是的，这很重要。人们经常以别人的看法去审视自己，尤其是在作为陌生人的时候。我的例子同时表明，对于教育的投资是值得的。我今天有一份好工作，我在瑞士消费，并在这里交税。**Jaisli:** 作为希望获得成功的企业家，我同样必须考虑公司的所在地。同时，我也必须面对公司所在地出现的问

题。如果我们今天找不出如何令难民自食其力的解决方案，我们非常明白，这将会带来怎样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因此在难民的教育和工作融合方面的投资始终是值得的，我坚信这一点。

难民的流动将造成社会的分裂：一边是愤怒的民众，另一边是负责救助工作的志愿者。因政治上对这些问题的否认而促使民粹主义的抬头，这一现象变得日益明显。您感觉到瑞士是怎样一种气氛？

Jaisli: 正如所描述的那样：备受争议。我自己有四个孩子，年龄从 22 岁到 31 岁。最小的在日内瓦学习，近几个月以来，一直忙着为难民提供支持，给他们上语言课，或介绍他们如何更方便地参加大学课程。中间的女儿完成了在伯尔尼的法学学习，目前在 Heks 法律咨询中心为寻求庇护者服务。我的朋友们也在从事难民收容方面的工作，她们在寻求有关接纳和融合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我也能感受到那些愤怒的民众强烈的抵触情绪。在我们的公司，我们为难民提供实习和体验式培训。我们向那些年轻人展示我们的企业；由我们的学徒做向导，因为他们与难民的年龄相仿，更容易沟通。我看到很多人在致力于寻求实用的解决方案。我认为，社会中主要还是正面的、建设性力量。**Opardija:** 激起人们的恐慌总是比消除恐慌更简单。因此，原则上，愤怒的民众更容易占得上风。在那些外国人居住最少的地方，在东德，在瑞士的 Appenzell 或 Uri，抵触的力量最大。强制法案的表决令我信心倍增。我感觉到，整个社会正涌动着一股力量。那些原来从不公开表达政见的人们，突然开始发声。我认为投票结果是一个重要信号。

在对强制法案进行表决时，各个民间社会组织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瑞士人民党的这一提案的行动。您对于这些非政党政治活动的影响怎么评价？

Jaisli: 有很多正面的力量通过他们的行动和倡议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包括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领域。但是如果认为这些力量能够超越政治势力的声音，就有些离谱了。投票时，决定胜负的是谁能定调，以及谁能将那些不置可否的人拉上船。令人遗憾的是，最终的结果，常常就是钱的问题。**Opardija:** 是否需要制定每次投票最多允许花多少钱的规则？**Jaisli:** 这不该由我来进行判断。但是，对于大规模移民提案的结果令我非常愤怒，因

为我们作为雇主失信了。我们不应该让它走得这么远。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阐明我们的意见，且必须在事实层面上应对情绪化。我们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据和事实澄清一些观点。但是这样一场宣传当然也需要花钱。**Opardija:** 在我看来，政治目前已远离了贴近每个公民日常生活的某些话题。但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这在根本上并不是一件坏事。我认为，这甚至是一件好事，因为政治活动的冲击会被公众感受到，而政治力量通常会在事后对此作出反应。我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